



宁马军队绥西抗战历史回眸

邵予奋



绥西战场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我国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马鸿逵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回族武装合作抗日。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与马鸿逵接触，并派遣张子华等党员赴宁开展统战工作，最终促使马鸿逵从“尽量容忍”转为坚决抗日，先后捣毁日特机关，处决日本间谍，拒绝日军诱降，并派遣军队参加绥西抗战，直接对日作战。

1938年5月，日伪军从归绥(呼和浩特)、包头西犯。傅作义退守山西，绥远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值此紧急关头，国民党军政委员会任命马鸿逵为绥西防守司令。命令中规定：除绥西现有各部队统归马鸿逵指挥外，并由马鸿逵部调拨步兵一个旅、骑兵一个旅也归马鸿逵指挥，开赴绥西，相机收复包头、绥远。马鸿逵对马鸿逵去绥西抗战持积极支持态度，派两个骑兵旅开往绥西，受马鸿逵节制。

1938年春，傅作义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进驻绥西，主持绥西军政，统一指挥所有部队。

1938年5月，马鸿逵率81军35师与马鸿逵部两个骑兵旅开赴绥西战场。

继马鸿逵部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义忠)在察南格勒庙首战告捷后，宁马部队先后参加了绥西会战的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

在包头战役中，35师各部按照傅作义的命令，坚持在乌镇一带防守河套，有力地保障了攻城部队的侧翼，起到了战斗配合作用。

在绥西战役中，35师先后参与乌拉包之战和乌不浪口、四义堂之战，均担任战斗主力，在师长马腾蛟指挥下，英勇顽强，与敌血战。

在1939年夏天的乌拉包之战中，日军受到严重打击而败退。

在1940年1月的乌不浪口、四义堂之战中，日军集结3万兵力、10余辆坦克及千余辆汽车向35师阵地发起进攻，35师3000余名官兵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死守阵地，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尽管装备简陋、冻伤严重，仍歼灭日伪军千余人，缴获军车及武器弹药，迟滞了日军西进步伐。

在这两次战斗中，日军凭借汽车、装甲车、坦克和飞机优势并施放毒气，致使马部伤亡极重，被迫转入沙漠地区。

在此后的五原战役中，宁夏部队配合傅作义部全歼日伪军，收复五原重镇，彻底粉碎了日军侵犯西北的计划。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

据战后统计，35师原有5000余人，战斗中牺牲1000余人，伤2000余人，冻伤者达700多人。

35师部队撤退后，当地居民主动掩埋阵亡烈士遗骸。在掩埋过程中，发现有遗骸血肉模糊、弹伤累累，仍保持着同敌人搏斗的姿势，甚至难以与敌尸分开；有的怒目而视，死不瞑目，嘴里咬着敌人带血迹的半片耳朵；有的虽伤痕累累，但带血的双手紧紧抱住敌人不放，仇恨的十指深深抠进敌人的肉里难以拉开。这种惨烈情景，真是催人泪下。

五原战役后，1940年3月，宁夏军队重返乌镇。傅作义部与宁夏军队寻获乌不浪口阵亡官兵遗骸，正式择地安葬。发现之前埋掉的尸体，由于天气转暖，尸体膨胀，露出沙土之外，并且已经腐烂。按照回族的习俗，归真(即去世)之人应以白布裹身并当日下葬。而这些阵亡异乡的回族烈士，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后却不得不匆匆下葬，草草掩埋，并且千余名牺牲的烈士中只有148名有自己的名字，其他均为无名烈士。

在匆匆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还未得到很好休整之时，1940年5月，35

师奉命移防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一带。在这里驻守了3年多，与日伪军发生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著名的有新民堡、王爱召等战斗。在此期间，马鸿逵整肃军纪，指挥战斗，在取得战斗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从1938年5月离开宁夏至1943年班师回宁，5年多的浴血奋战，宁夏抗日军队将热血洒在绥西战场，也将宁夏军队的威名种在了内蒙古人民心中。绥西抗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西北门户，彻底粉碎了日军侵占宁夏的阴谋，还牵制了华北日军力量，保障了苏联援华物资通道的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为了表彰宁马军队的抗日功勋，1945年10月国民政府给马鸿逵颁发了“忠勤勋章”。

感叹宁马军队在绥西抗战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赞宁马军队绥西抗战(新韵)
绥地烽烟起，西军赴阵前。
鸿宾扬义帜，血刃斗凶顽。
激战歼倭寇，捐躯护故园。
英雄昭日月，浩气永流传。

注①：绥地，指绥西。
注②：西军，内蒙古人民称宁夏军队为西军。
注③：鸿宾，即马鸿宾，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绥西防守司令，第81军军长，统率宁马军队并指挥绥西驻军参加绥西抗战。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曾任该室副主任、巡视员和宁夏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徐满库：筹粮支军 抗日救国

徐满库(1903—1984)，男，宁夏彭阳县人。1924年毕业于固原县高等小学，曾在家乡的刘塬、城阳一带任教。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和靖远一带后，即向东北挺进，经海原、同心进入陕甘宁边区。11月发起有名的山城堡战斗，围歼胡宗南七十二师两个旅，胜利完成了长征。12月，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促成了国共合作，从此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停止，转入全面抗战阶段。抗日浪潮遍及长城内外、大河南北。翌年初春，红二十八军开到固原县东部山区，驻扎在草庙、城阳、红河一带。军部设在白杨城东门外刘家官院。红军到来之后，即着手组建政权，向当地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红军的到来，犹如一股暖融融的春风，给这块偏僻的土地带来了生机。

徐满库在当地算得上一位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认识自然比一般人高过一筹，他主动接近红军，接受革命道理。二十八军政治部部长张国生看出他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便热情邀他促膝谈心，为他讲述全国形势。徐满库认识到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正义之师，便十分兴奋地牵了几只羊作为慰问品，请张国生科长领他到军部。军部领导接待了徐满库，并进一步向他讲解了团结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道理，鼓励他为宣传抗战作出贡献。徐满库倍受鼓舞，更加激发起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家后当即动员家人，捐出八石(约四千斤)谷子支援红军。

当时，为了争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红军已经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可是，一切富豪大户仍然闻风躲藏，不敢露面，更不敢接触红军。徐满库接受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委托，四处奔走，将那些不了解红军政策而外出躲避的人动员回乡，帮助他们消除顾虑。在红军的帮助下，他们组建起“固原东山抗日救国后援会”，徐满库任主任，另有八名积极分子担任委员，确定了“征集粮食支援军队，向红军提供当地情况，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四项工作任务。在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发动和领导下，城阳川有的粮户争相向红军捐粮，短短的时间内就捐出小麦120石(约六万斤)，给红军以有力的援助。红军对此十分感谢，在一个逢集的日子里，二十八军政治部在城阳街庙戏楼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张国生同志讲了话，正式宣布成立“固原东山抗日救国后援会”，并以政治部名义赠给该会绣有“团结御侮”四个大字的绸质刺绣匾一幅，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振奋。徐满库双手捧起这幅软匾，心情激动，双眼闪着泪花。会后，军部文艺宣传队演出了以宣传抗日和军民团结为主题的文艺节目，气壮山河的雄壮之声激荡在城阳街的上空。

全国解放后，徐满库将这珍藏十多年的革命历史文物交给白阳城乡政府，后遂上交，在征集党史资料时被选送北京，现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青铜峡水电站：中国唯一一座闸墩式水电站(上)

青铜峡水利枢纽是黄河中上游、宁夏内一座灌溉发电为主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其电站部分为低水头河床闸墩式。坝长687.3米，高42.7米，设计水头18米，装机8台，容量272兆瓦。灌溉面积550万亩，工程投资2.5亿元，1958年开工，1967年发电。

青铜峡水电站的特点是：8个机组电站坝段为7个溢流坝段相间布置，电站边墙就是溢流坝挡水闸门的支墩，称之闸墩式电站。站坝段设置2个空间曲线型排沙泄水底孔。机组厂房为半露房，半门式起重机械，其轨道一侧在厂房内。另一侧在大坝检修时，要吊开厂房顶金属八角帽，才能进行机组安装检修。

青铜峡闸墩式水电站是中国最早的闸墩式水电站(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闸墩式电站始建于南斯拉夫)，是原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青铜峡枢纽工程项目设计总工程师、后来是西北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万宗尧同志在苏联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闸墩式电站优点是：这种布置能保持电站上下游水流防止集中冲刷，利于排泄污物。机组坝段泄水管能防止坝前淤积，减少水轮机磨损，缩短泄水建筑物长度，泄水管泄水时射流效益能增加发电量。最主要的是解决多泥沙河流上建坝的淤积。坝两端渠首电站解决发电灌溉用水矛盾。

闸墩式电站缺点是：机组坝段泄水管与尾水管呈立体交叉泄水管平面上绕过尾水管，立面上从机组进口下方进口，逐渐上升到尾水管上方出口，进口高3.55米缩至出口高1.5米是空间曲线型。结构复杂、孔洞多占曲线剖面面积50%；是薄壁结构，最薄处仅1.5米，梁多、闸门多、闸门拉杆多、风水油管路长；施工难度大，砼温度控制难。

面对这种新型复杂的坝型(相对三门峡)，结合当时施工和技术水平，工程建设困难多，施工难度大。在工程施工期间和工程施工以后，对青铜峡这种坝型(或枢纽布置)，一直争论不休。设计单位认为，闸墩式电站布置很好地解决了黄河多泥沙流上坝前淤排沙问题；解决了灌溉发电用水矛盾。认为

为闸墩式电站在青铜峡具体环境下是基本合适的坝型。施工单位认为，青铜峡地处内陆高寒地区，当时技术力量薄弱，施工机械奇缺；气候干旱、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时间长，对砼浇筑温度控制不利。而这样电站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以及后来出现设计失误，进水口和泄水管隔板少配钢筋，以及砼裂缝大量出现，治理艰难曲折，施工单位始终认为，青铜峡采用闸墩式电站的形式是不适宜的。施工期间，由于水电部领导的坚持，1959年钱正英部长说：“闸墩式电站布置，作为我们国家水电建设的一次尝试吧。”才得以建成中国第一座闸墩式电站。

1994年钱正英同志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青铜峡水利枢纽专辑》题名：“青铜峡水利枢纽是黄河综合开发的成功范例。”它的建成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颗璀璨明珠。它记录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水电工人艰苦创业的伟绩，广大干部工人劳动智慧的结晶。它在西北边陲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回顾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设，使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启示和帮助。

一、青铜峡水利枢纽勘测设计的特点

1954年国家批准了青铜峡灌溉枢纽工程，并列为1957年前黄河第一期开发项目。计划分两期开发：第一期建挡水坝，抬高水位1.5米不发电，正常高水位1137.5米；第二期抬高水位7.5米，正常高水位1145米，装机容量105兆瓦。两期工程总投资2.35亿元。据此1955年由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开始勘测设计工作。至1957年11月，提出了《黄河青铜峡规划报告》，确定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灌溉、发电同期开发建设。提出枢纽正常高水位1156米，装机容量260兆瓦，投资2.64亿元。1958年8月，西北勘测设计院提出《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确定灌溉发电一期开发，同期建设，水库正常高水位1156米，扩灌面积550万亩，装机容量272兆瓦，年发电量12.85亿千瓦时。考虑黄河是世界上多泥沙河流之一，坝址河面开阔。因此，枢纽采

用了河床闸墩式电站。为满足灌溉发电需求，设计了河东西两大型渠首电站。为防止电站泥沙淤积，每个电站坝段设立两孔呈空间曲线型泄水排沙管(8号机设1孔)。

枢纽勘测设计的特点：
坝轴线位置的变更

1954年，《黄河技术经济规划报告》中选定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为青铜峡中上段山神庙(野马墩)坝址。1957年经设计、勘探人员勘测后，认为此坝址地质条件较差而被否定，推荐峡谷下段点将台和龙王庙坝址。点将台坝址在河床钻孔后，发现坝址岩石破碎而被否定。在龙王庙坝址300米地段内，拟定了4条坝轴线进行钻孔比较，最后选取最优的3号坝址作为枢纽坝轴线，结束了枢纽坝轴线位置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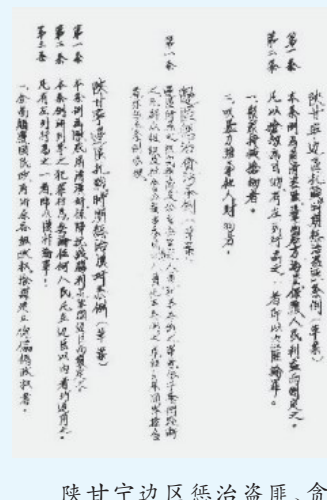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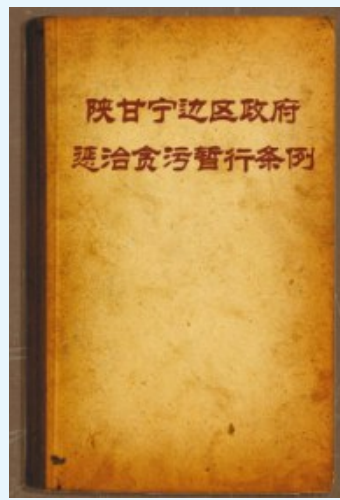
枢纽布置方案(坝型)的争论

青铜峡水利枢纽布置形式，采用了河床闸墩式电站，两侧重力坝、河床土坝组成。电站和溢流坝相间布置，每个电站设两个空间曲线型排沙泄水底孔，其中河东西为两台渠首电站。河东西布置了岸边泄洪闸和预留船闸位置的土坝。这种布置形式是否适合青铜峡水利枢纽？从开工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争论，一直争论了20多年，直到工程建设完工交付运行，争论仍未结束。设计、施工、运行单位各持己见，施工时期1958年9月、1959年2月、1960年6月经过三次大的方案争论，由于水电部坚持，才建成青铜峡这座闸墩式水电站。直到1994年钱正英同志题词“青铜峡水利枢纽是黄河综合开发的成功范例”才有结论。

确保下游农田灌溉

青铜峡水利枢纽建设前，古老的青铜峡灌区就已存在。灌溉是宁夏农业生存的命脉。在枢纽建设期如何保证下游灌溉是设计、施工重大任务和重大难题。施工导流、基坑开挖、砼浇筑、机组安装都得围绕每年五一前放水灌溉为中心进行安排，其他工作都得服从这一中心。工程从开工起，时刻考虑着确保灌溉，甚至超过了考虑主体工程施工。这给工程设计和施工带来很大困难和增加工程复杂性。(据《宁夏文史资料》)

陕甘宁边区 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汉奸条例草案。

“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表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2年1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针对陕甘宁边区查处的肖玉璧贪腐案发表评论《从肖玉璧之死说起》。

肖玉璧，出生于陕西清涧县马家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清涧支队，在作战中英勇无畏，立下赫赫战功，身上留有几十处伤疤。由于多次伤病严重，再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肖玉璧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肖玉璧住院期间，恰逢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毛泽东见到骨瘦如柴、身体虚弱的肖玉璧，要求为他增加营养。肖玉璧康复出院后，上级认为肖玉璧是有革命觉悟和革命贡献的可靠老战士，便安排他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

然而，这样一名无惧生死的革命战士，却在金钱诱惑面前蜕化变质。肖玉璧上任后，不但以功臣自居，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出去牟利。

当时，边区各级政府厉行节约、勤俭节约支持抗战，整个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不过30元。肖玉璧却于任内共贪污公款3050元，根据边区惩贪条例应判处死刑。

边区政府很重视此案，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1941年，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对革命有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念他过去作战有功，希望能让他上前线，在战场战死。为慎重起见，林伯渠带着肖玉璧的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肖玉璧案的相关情况，并征询林伯渠的意见。

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败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毛泽东当场表态：还记得怎么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跟那一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纪律规矩面前没有特权。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在边区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严惩黄克功、肖玉璧，彰显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凸显出我们党始终如一的一般的纪律。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始终把惩治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制定一系列法规文件，彰显厉行廉洁政治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随着边区政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确保政府的廉洁性和高效运行。

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贪污罪名的10种行为和4个处罚量刑标准。其中将克扣截留财物、挪用公款、虚报账目、浪费公物等均列为贪污犯罪行为；对贪污数额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一部专门针对贪污罪行为惩治的法律，几乎涵盖了在当时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对于全体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发挥了重要的约束与警醒作用。

1939年，由于货币贬值，加上重在以教育为目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修改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时，对死刑的贪污款由500元以上，改为1000元以上，处死刑。《条例》特别明确规定了贪污的10种行为：(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交纳财物者；(2)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占公有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图盈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盈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财物者。

1938年颁布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明确了贪污行为、惩处原则、惩处依据、惩处标准等，为惩治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反腐败工作走上法治轨道。贯彻条例后，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使整个边区社会风气良好，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1年5月1日批准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政务人员应“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经过数年努力，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国际友人、各界民主人士评价为“中国最廉洁的政府”。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廉洁政治的丰碑。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尽管还只是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但丝毫没有放松对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惩处。正是这种对腐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党的优良作风得以弘扬，党的纪律得以遵守，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党获得了事业发展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始终严格当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行为，除了陕甘宁边区，其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也先后制定了类似的法规、禁令。如1938年，中共察冀省委发出《中共察冀省委关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1940年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等。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